

战争造就军队，军队塑造和平。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拒战争于门外，就是因为拥有一支随时准备打仗的军队。习近平主席在领航强国强军实践中，高度重视军事力量的战略运用，反复强调军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军事斗争准备须臾不可放松，要求全军做好随时打硬仗的准备。我们要坚决听从习近平主席号令，不断强化能打仗、打胜仗的责任担当，抓紧抓实练兵备战，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随时打硬仗是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

随时打硬仗是人民军队一脉相承的光荣传统。我军历来具有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打过无数硬仗恶仗。从红军长征到抗日战争，从三大战役到抗美援朝，从抗洪抢险到抗震救灾，我军之所以能一次次创造出胜利的奇迹，很重要的是因为有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有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胆气豪情。这种革命的作风和精神，是一种无坚不摧、让人望而生畏的战争力量，在今天依然光芒四射、激励人心。必须继承发扬这种血脉基因，时刻准备投入战斗、迎接硬仗恶仗，在新长征路上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随时打硬仗是强国对强军提出的紧迫课题。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的复兴图强不可阻遏，但又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可以预见，我国越是发展壮大，面临的压力阻力将会越大。战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危险现实地存在。“霸权主义的和平历来是准备战争的工具”。中华民族要复兴图强，就必须常存忧患；军队要为强国复兴提供战略支撑，就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历史反复证明，一支能打硬仗、善打硬仗的军队是民族的希望、和平的保障。战争今夜就可能来临，军队



做好随时打硬仗的准备

周俊杰

必须鼓足战斗意志，枕戈待旦。

随时打硬仗是拓展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基本标准。立足最困难、最复杂情况做工作，体现的是问题意识、底线思维。抓好军事斗争准备，有一个“备大患小，备小患大”的规律。正如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必须“把工作放在最坏的基础上设想”“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这样才能为战争胜利争取到充分的条件。当今世界，军事强国从未放松练兵备战。战争筹划追求精确庙算，但往往“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面对可能发生的战争风险，我军只有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宁可备大备强、不可备而不足，才能真正提高军事斗争准备的针对性实效性，才能在实战中掌握主动、赢得胜利。

必须推动备战打仗有一个很大的加强

以整风精神纠治备战打仗中的顽症痼疾。当前，我军“两个差距还很大”“两个能力不够”，依然很现实地

摆在面前。存在这些问题，思想根子是不少官兵得了“和平病”，危机意识淡薄，思想精神懈怠，以不打仗的心态做打仗的准备。打仗思想不牢、练兵备战不抓紧，战争机器就会生锈失灵。全军官兵都应行动起来，深入查找与打仗要求不符的“和平事”“和平套路”，列摆表现、深挖根源，对问题积弊进行大起底大扫除。要坚持边查边改、彻查彻改，把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确保整改见底见效。要拿出自我革命精神，统一意志、付诸行动，持续努力、久久为功，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

突出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能力建设。现代战争，前线是血与火的对抗，后方则是指挥能力的比拼，尤其对作战指挥的战略性、联合性、时效性、专业性、精确性要求越来越高。要抓住深化军队改革契机，坚持联合作战统一筹划、统一指挥的大方向，构建适应打赢信息化战争、能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真正形成联合作战指挥能力。以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建设为重心，加强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在联合作

战指挥机制、人才、手段、理论、法规制度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坚持以战领建、建是为战，厘清战区 and 军兵种关系界面，推进军种指挥深度融入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形成权责清晰、顺畅高效的工作格局，增强新体制下练兵备战工作合力。紧紧扭住制约联合作战指挥的突出矛盾，集智聚力、专攻精练，以重点问题的突破，加快把指挥体系和能力建设搞过硬。

把日常战备工作提到战略高度。兵可以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用。战场上的优势是靠平时的准备累积起来的。要围绕平战转换这个枢纽，加快建成平战一体、高度戒备、随时能战的作战值班体系，提高快速反应能力。狠抓各项战备制度落实，保持指挥顺畅、不间断，保持政令军令畅通，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跟踪掌握国际国内安全动态，搞好战略预值预置，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确保一旦出现突发情况能拉得住、应对得了。立足各种可能性条件，周密做好方案计划，真正把打什么仗、与谁打仗、在哪打仗等问题弄清楚搞明白，把敌情摸清、把任务研

透、把战法练活、把保障抓细。要时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应急备战之势，加强应急处突力量建设，确保部队不经临战训练、不经调整补充就能遂行任务。

着力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磨砺精兵

下功夫把备战打仗的带头人锻造好。刘伯承指出，军官的培养，是最艰巨的战争准备。各级领导干部应深刻体悟习近平主席的“胜战之忧”，设想战争马上就要开打，问问自己“究竟有没有带兵打仗、指挥打仗的底气？”如若不然，就应强化“本领恐慌”，抓住转型发展这个契机，扭住实战练兵这个根本，带头进训练场，带头到考核场，带头上比武场，做到上阵能指挥、上场能组训、上装能操作、上网能作业，使自己成为能打胜仗的“领头雁”。树立正确的事业观权力观地位观，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着力提高战略素养、联合素养、指挥素养、科技素

毛泽东从缴获电台被砸看出大问题

李 明

1930年8月20日，毛泽东带领红一军团取得文家市战斗的胜利，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在战斗中，红军本来缴获了湘军戴斗垣旅一部无线电台，这对当时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信的红军而言意义重大，但战士们却将这好好的电台给砸烂了。毛泽东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在当时，由于我军脱胎于旧军队，以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建立的根据地身处农村环境且被敌人分割包围，长期进行的又主要是游击战、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因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游击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游击主义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适合我军幼年时期官兵文化低、武器差，主要采用游击战、运动战，根据地流动性大的实际，不能像“左”倾错误者那样笼统地全盘否定而不顾实际情况地进行过头的正规化；另一方面，游击主义又有严重的消极影响，突出表现为“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严重影响军队战斗力，必须随着我军建设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去除掉，其中首要的是从官兵的教育训练入手。

井冈山时期，由于战斗频繁，伤亡又大，部队中补充了很多游民分子，毛泽东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他常常亲自给官兵上课，教育他们养成严格的纪律，克服流寇思想。由于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的限制等原因，红军中产生了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许多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

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四军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对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剖析，并一一指出了纠正方法，加强对官兵的教育管理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红军组建初期，由于相关制度没有建立，征兵比较随意，各部队“只图征集小公差兵及任意增添挑夫，极少注意战斗兵之补充”，更有招募五官不全、驼背、跛足及患病者。新兵的训练很差，“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老兵的训练也不统一，正规化程度很低。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2连排长的开中中将赖毅后来回忆说：“我们一、二连每天在一个操场上出操，但一连是北洋军阀式的操法，而我们二连则是黄埔军校式的操法，相互间瞧不起。”为改变这种现象，毛泽东在龙江书院创办了教导队，后在其基础上成立了随营学校，开始了红军初步的正规教育训练。1930年三四月间，毛泽东主持颁发了《关于官兵考绩的训令》《征集和教育新兵问题的训令》《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等3个训令，以法规条令的形式规定“教育以集中为原则”，并明确了征募新兵的条件、手续以及军事训练的组织和内容，有力改变了过去红军教育训练的无序状况，提高了部队的正规性。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我军的迅速壮大，毛泽东创造性地通过整军这个方式来提高军队的正规性，要求各区结合军事整训，加强政治的教育和训练，克服游击习气。他领导我军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并在各地建立分校，亲自规定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风，确立了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体力智力统一、军事政治配合的教学原则，贯彻启发式、讨论式教学方法，进行正规的教育训练。解放战争后期，我军中也曾

出现了一些较为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毛泽东号召全军，加强对官兵的管理与教育，提高他们的集中统一性和组织纪律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军向苏军学习加强自身建设，现代化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与之相适应，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五统四性”思想，指出我军已经到了掌握现代技术的建军高级阶段，与之相适应的就是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培养部队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从而克服游击习气实现部队建设的现代化正规化。由于战争平息进入和平年代，当时不少部队出现了教育松懈、纪律废弛的现象：某营演习，集合时间长达一小时零八分钟；某师测验，老战士中有6/10连枪炮的口径和正确瞄准的要领都忘记了；某营点验，一小时晕倒数十人；换装部队不按条令使用武器，有的炮手不会退弹，就用大锤敲打；等等。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了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各级干部中长期存在的游击性的习气，缺乏严格的军事管理的要求”，没有“按统一的规定来组织部队的工作日程”，要求全军加强管理，进行一次“以严格执行命令指示，严格军风纪，严格遵守制度”为内容的教育，坚决纠正过去的非正规现象。1953年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军开展了正规化训练，官兵们依照条令、规范进行军事教育和训练，正规化意识得到强化，组织纪律性不断提高，带动了我军建设的飞速发展。



抗战胜利后，为保卫晋东南根据地，阻滞国民党军北进，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于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对国民党进犯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歼灭战，共计歼敌13个师及2个挺进纵队3.5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7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及大量军用物资。上党战役的胜利，正式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实现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正确有力战役指导。料敌于先，是军事指挥员指挥作战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毛泽东等老一辈军事家深知蒋介石的和谈把戏，把“打”作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工作基点，周密筹划整个战役，使得战役始终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8月26日开始，面对蒋介石集团对上党地区的入侵，中央军委先后指示晋冀鲁豫军区进行自卫反击，集中太行、太岳军区主力首先歼灭阎锡山进入长治的部队，收复上党地区，消除腹心之患。9月4日，军委又进一步指出：“在进行上党战役中，阎（锡山）如从太原、临汾、平遥等地来援，于我有利，待其进至适当地域给予歼灭，你们应有此独立机动的灵活作战准备。”刘伯承、邓小平坚决贯彻军委指示方针，研究作战部署，提出“打好上党战役，支援重庆谈判”的口号，决心集中正在整编的太行、太岳、冀南3个野战纵队及地方部队共3.1万人，并动员5万民兵配合作战，将敌消灭在长治地区。针对敌孤军深入和分散守备的特点，决定先期扫清屯留、长子、壶关等长治外围敌防御薄弱点，吸引长治守敌出援；当其惧怕被歼而据城待援时，则在运动中歼灭驰援之敌；当长治守敌求援无望、意志动摇而弃城出逃时，我则以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将其彻底消灭。

注重对敌作战研究。刘伯承指挥作战，高度重视任务、敌情、我情、地形和时间这五件事，强调：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特别是对敌情分析，每战前总是做到详细、精辟、透彻。攻克襄垣后，刘伯承主持起草《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下发部队，总结襄垣战斗中的经验教训。《指示》客观分析了晋绥军优缺点，指出晋绥军“长于防御，构筑品字形据点碉堡，控制强大的预备队，实行反突击”“配置有外围据点，形成犄角之势”。

野战中，“采取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正面钳制左包右抄）”，但一般善于白刃格斗，其特点是善于守城，极不善于野战，反对莽撞、拼命地猛冲猛打，不计伤亡和效果的游击作风，为取得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9月18日，在攻打长治外围的基础上，刘伯承又起草下发《长治作战中几个战术问题之指示》，强调“登城战斗将成为长治作战决定胜负关键”，要求登城时应利用手榴弹、炮火等掩护，同时多路发起攻击，使敌分不清主攻、助攻，而后通过城内纵深战斗将敌分区划块各个消灭。

贯彻运动歼敌思想。高明的军事指挥员总能因敌而变、因情而变，善于从敌弱处开刀，灵活使用兵力和战法，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刘伯承针对阎军“三只老虎爪子”的战术，制定了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运动战指导思想：即以小股部队接敌，摸清敌情后佯装败退，鸣枪示警，将敌诱至我设伏地域，我以阶梯配置兵力和火力聚歼之，或者钳制“两只老虎爪子”，消灭另外“一只老虎爪子”。在消灭驰援长治的彭毓斌部时，我以冀南纵队、太岳纵队一部及地方武装力量伪装成主力猛攻长治，看住长治守敌使其不敢断然出击，再集中3个纵队主力兼程北上，与原担任白晋线监视任务的第17师合兵，预伏于屯留、鹿亭地域。10月2日，先头部队与敌遭遇后，将敌诱至野战地域，围其于老爷岭、磨盘脑和关上村地区。敌发现被困后，企图依托工事和优势火力大量消耗我军，我军则采取夜坚守的战法，避开敌人锋芒，从敌弱处着眼，分割包围逐次缩小包围圈，并配置强大的预备队，消灭敌人的反冲击纵队，使其斗志渐失。10月5日，敌援军向北突围，我迂回部队迅速抢占制高点截敌退路，与主力合力在运动中向敌展开攻击，激战至次日敌援军大部被歼。

放手发动人民群众。人民的支持是我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法宝，是人民战争的伟力所在。晋东南人民在此次作战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是参军参战。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晋冀鲁豫军区的参军号召，太行区仅7天时间就有4.5万多名民兵和自卫队员加入正规部队，太岳区参军人数达1万多人。各县民兵也以营连为单位，迅速组织起来随军参战。二是火线支前。各县建立了前方兵站，组织支前民工救护伤员、运送武器弹药和粮草。战役中，屯留县1.8万多名妇女

养，做到懂打仗、善谋略、会指挥。贯彻训练一致促进练兵备战是深走实。训练和打仗本质上是统一的，训练是为了打仗，打仗是最好的训练。军事训练作为提高实战能力的基本途径，是部队能打硬仗的重要前提。把握实战化是军事训练的根本属性和要求，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部队最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全面贯彻我军新军事训练大纲，坚持实战实训、联战联训，紧贴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大抓体系对抗训练，大抓复杂环境下训练，大抓极限条件下训练，加大科技练兵力度，把战略战术练精，把作战体系练强，把制胜招法练过硬。主动适应“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现代战争特点，创新训练理念和方法手段，按作战的要求训练、按训练的方式作战，发挥好军事训练的战争预实践作用。

坚持在实践中锤炼顽强的战斗作风。军队可恃的利刃，既靠武器装备更靠战斗作风。“过去我军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要坚持从理想信念入手，加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我军根本职能教育，培养革命军人的忠诚品格，解决好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当兵干什么、练兵为什么等根本性问题。科学设置练兵环境，着力把情况设险、把对手设强、把困难设够，注重在艰苦恶劣环境中摔打部队，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磨炼部队，通过练谋略、练战法，练勇气，切实把革命军人的精气神提振起来。坚决摒弃“危不施训、险不练兵”消极做法，做到实字当头、从难从严，最大限度地激发军人的血性，赓续人民军队的胜战基因。



揭开解放战争的序幕

丁顺发 董大强

组成战地宣传队、护理伤员组和后勤服务组，积极活跃在战场上。后勤指挥部原计划调平顺县民兵支前1500人，而报名人数就达2743人，还有4395人参加民工运输队和担架队，平顺县成为“参战支前的模范县”。三是搞好后勤保障。后方群众积极组织兵站和运输队，赶制攻城器械、做鞋、缝洗衣服、站岗、造弹药、看护伤员和组织秋收秋耕等，1个月就造出手榴弹4万余枚、各种炮弹2600余发，攻城梯子20多架，军鞋近2万双，地方政府还把医生们组织起来，累计收治伤员2400人，有力地支援了前方作战。

